

西夏语的小舌塞音※

聂鸿音

对西夏语音韵系统的构拟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学界已提出了四个比较完整的构拟方案,即西田龙雄方案(1964)、苏敏方案(1968)、黄振华方案(1983)和李范文方案(1986)。由于西夏语资料大都残缺不全,而且彼此间也不尽一致,所以四位西夏学家的构拟方案也大相径庭,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方案无法应用于藏缅语言的比较研究。

即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新出土的西夏文献,要想研究出一个完美的西夏音韵系统无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在我们只能尽量细致地分析手头的资料,以求多获取一些有关这门古代语言的知识。本文提出小舌塞音的假设,便是基于上述考虑而作出的尝试。

我们的问题产生于12世纪的夏汉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几个“二合”注音字。我们已经知道,当《掌中珠》的编者用两个汉字来给一个西夏字注音的时候,如果他不使用“反切”拼读法,那么就总是要遵循这样一条原则——二合注音的第一个汉字标志着与该西夏字声母相近的发音部位,而第二个汉字则标志着与该西夏字声母相同的发音方法。举例来说,二合字“尼卒”(近古汉语: nitso)的意思是 $n + ts = dz$, n 和 dz 都是前舌音, ts 和 dz 都是塞擦音。然而,《掌中珠》里有几个二合字却似乎是打乱了这条原则,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夷+舌根塞音”这种类型,如“夷隔”、“夷格”、“夷耿”、“夷皆”、“夷客”。在宋代汉

语西北方言里,“夷”的声母是个喉塞音,可是当“夷”和一个舌根塞音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又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西夏声母呢?首先,这个西夏声母不可能是 $*y_k$ (西田, 1964),也不可能是 $*y_g$ (黄振华, 1983),因为至今我们尚未找到任何证据以支持西夏语有复辅音的假设。其次,这个西夏声母也不可能是喉塞音 $*ʔ$ (苏敏, 1968),因为《掌中珠》的编者在音译西夏声母 $*ʔ$ 的时候,只需使用单个的汉字(如“厄” $*ʔe$),而完全没有必要用两个。第三,声母 $*y$ (李范文, 1986)似乎比较合适,因为它不仅符合传统汉语音韵字上的“五音”分类法,而且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一些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然而,这个 $*y$ 同样打乱了《掌中珠》的夏汉对音原则。我们知道,西夏人有时可以承认擦音和塞擦音之间的转换,但绝不允许有擦音和塞音之间的转换,因此人们可以问:如果《掌中珠》的编者打算用二合字来表示西夏语的舌根浊擦音声母,为什么他不使用“夷核”、“夷幸”、“夷谐”呢?这不是显然比“夷隔”、“夷耿”、“夷皆”合适得多吗?

我们必须另找出路。根据黄振华对西夏字典《文海》的反切系联研究, $*y$ 声母的西夏字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与“夷隔”等对音的一类从来不和另一个 $*y$ 类相混。这一事实表明,这个未知的西夏声母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 y ,但一定是另一个与 y 相近的音。这个

※第24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原文是英文,题为Uvular Explosive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西夏声母应该是浊音，因为《掌中珠》里的二合汉字几乎没有用来表示清声母的。它还应该是个塞音，因为二合对音字中的第二个字（隔/客）指出了这个发音方法。至于它的发音部位则既不可能是喉部也不可能是舌根，因为《掌中珠》通常用单字“夷”来对译喉塞音，并用传统上的“牙音”类汉字来对译舌根塞音。这样，就只有一个音符合上述的客观情况了——真正的答案是*G。

声母G是个小舌浊塞音。汉语里没有这个音，所以西夏人不得不用一种权宜的方法来对译。在“夷隔”型的二合字中，第一个汉字“夷”并不表示精确的发音部位，它的意思只是表明这个西夏声母的发音部位应该比普通的K稍微靠后一点。有几张西夏佛经残页上的藏文注音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吐蕃人用g来粗略地对译西夏声母*G，因为在古代藏语里没有小舌塞音。G/q和ɣ/x乍听起来十分相近，因而我们可以找到它们在任意二者之间互用的许多例证，这些例证在阿尔泰—汉语和汉语—阿尔泰语的对音中尤为常见。著名的蒙古语词Qaraqoto（黑城）在汉语译作“哈拉浩特”，其中汉语的“哈”

（xa）相当于蒙古语的qa。汉语的“弘福寺”在回鹘文译作Qungwusi，其中回鹘文的qung相当于汉语的“弘”（ɣuŋ）。后面一种互用情况可以用来解释《掌中珠》里的一些汉语借词，例如汉语“学”（*ɣɔk）和“鞋”（*ɣai）的西夏读音都是*Gai（夷隔、夷皆）。

根据李范文的研究（1989），《掌中珠》里共有15个西夏字同属这一反切系列，其中一些字译为“夷隔”、“夷耿”、“夷皆”，另一些字译为“。吴”、“。鼉”、“。药”、“。余”、“。恶”之类单个的汉字。这就是说，我们假定的这个*G声母系列至少包括15个西夏字，而在意料之外出现的单个对音汉字“鼉”、“。药”、“。余”、

“。恶”只是粗略的对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音汉字“吴”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圆圈——“。吴”。在我看来，这个小圆圈显然是个注音符号，它表示“吴”的声母（宋代汉语西北方言：g）应该比普通的发音部位稍微靠后一点，也就是变读为G。

我们现在来选取几个带声母*G的西夏常用词来进行一下比较研究，以检验我们的构拟是否正确。所涉及到的语言都是被人们认为与西夏语亲属关系最近的，即彝语（武自立等，1984）、羌语（孙宏开，1981）和木雅语（黄布凡，1985）。

藏*Gai，“力”，汉字对音“夷隔”——彝语：qhe，羌语：dʒɪ qa，木雅语：qhə xo（帮助，加强）。

藏*Gai，“害”，汉字对音“夷隔”——彝语：qhA（损坏），羌语：qhe（损坏），木雅语：qhotsa（扼杀）。

藏*Go，“头”，汉字对音“。吴”——彝语：o qo，羌语：qə po tʂɪ。

藏*Go，“门”，汉字对音“。鼉”——彝语：A qə，木雅语：xə。

十分清楚，西夏声母*G与上述三种藏缅语中其他的小舌辅音相对应——彝语的q/qh，羌语的q/qh，木雅语的qh/x。进一步的比较研究还表明，彝语、羌语和木雅语中带小舌塞音声母的词不仅和与西夏语带*G的词相对应，而且还与另一些带舌根声母*k、*kh的词相对应。下面举几个例子：

藏*kua，“锄”——彝语：qo（榜庄稼），木雅语：tə qo。

藏*kiu，“散”——彝语：qə，羌语：phaxa（解开），木雅语：ha qho（解开）。

藏*ka，“怕”——羌语：qu，木雅语：tha qa。

藏*khai，“米”——彝语：qhə（面），羌语：qhə，木雅语：qə（麦）。

为了解释上述事实，我们必须构拟出另

一个小舌塞音——清音**q, 这个音只见于“前西夏语”, 而见于西夏时代的西夏语。

可以相信, 在“前西夏语”或原始党项语中有两个小舌声母并存。浊音*G完好地保存在12世纪的西夏语里, 但在彝语、羌语和木雅语中变成了清音q/qh, 而清音**q则完好地保存在上述三种藏缅语里, 但在后代的西

夏语中变成了舌根声母*k/kh。这两个语音演化的步骤可以分别解释为清化和顎化。以前我没能认识到西夏声母*G的存在, 我愿意通过本文修正我以前的结论(聂鸿音, 1985)。

感谢伍铁平教授在本文写作期间给予我的帮助。

参考文献

- ①黄布凡:《木雅语概况》, 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3期, 页62~77。
- ②黄振华:《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 见《文海研究》(史金波等著), 页65~13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 ③李范文:《同音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年。《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二》, 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页22~33。
- ④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 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3期, 页50~61, 80。

- ⑤苏敏(M. V. Sofronov):《西夏语语法》(Grammatika Tangutskogo Yazika), 卷2, 莫斯科:Nauka, 1968年。
- ⑥孙宏开:《羌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1年。
- ⑦武自立等:《彝汉简明词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4年。
- ⑧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 卷1, 东京:松香堂, 1964年。

附: 英文提要 Abstract

I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were no uvular explosive init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but as we see, this conclusion cannot be used to explain certain facts of Tangut-Chinese transcription in the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and to some extent, it interferes wit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make out a hypothesis of uvular init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the pre-Tangut language. Our evidences are: 1) according to the fanqie spellings in the Tangut dictionary wenhai, Tangut characters with initial *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of which takes a fricative initial, the other takes an explosive initial; 2) Tangut characters of the said explosive group are transcribed by Chinese binoms yige 夷格, yijie 夷皆 or some other characters with small rings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 should be a little bit back of the ordinary k; 3) some of the Tangut words with our assumed initial *G prove to be cognate to the corresponding words with uvular initial q/qh in some other Tibeto-Burman languages. we may also believe that there co-existed two uvular initials in the pre-Tangut language, i.e., a voiced *G and an unvoiced *q, the former being well preserved in Tangut but becoming unvoiced in other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latter being well preserved in som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but becoming initial k/kh in the Tangut language.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责任编辑 天明)